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货币供给机制研究： 历史、逻辑与实证 (1910—1935)

The Research on the Money Supply
Mechanism of China: History, Logic &
Empirical Analysis (1910—1935)

○ 刘巍 陈昭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货币供给机制研究： 历史、逻辑与实证 (1910—1935)

ZHONGGUO HUOBI GONGJI JIZHI
YANJIU: LISHI LUOJI YU SHIZHENG
(1910—1935)

○ 刘巍 陈昭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总 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探索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奥秘、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其研究能力和科研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没有真正强大的国家。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党中央在新时期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前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学科齐全，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长期以来，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献身科学，甘于寂寞，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服务党和政府的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着难得

的发展机遇。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振奋精神，锐意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思想库作用，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社会事业，是一种繁重而复杂的创造性劳动。精品源于艰辛，质量在于创新。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态度，离不开辛勤的劳动，离不开创新。树立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名逐利的良好学风，是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营造有利于学者潜心学问、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为此，自2006年始，教育部实施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计划，旨在鼓励高校教师潜心学术，厚积薄发，勇于理论创新，推出精品力作。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欣然为后期资助项目题字“厚积薄发”，并篆刻同名印章一枚，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亦为此题字“生也有涯，学无止境”，此举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深切勉励和由衷期望。

展望未来，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宏伟目标和崇高使命，呼唤着每一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和智慧。让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以优异成绩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序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的 100 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在这一巨变时期,中国经济结构开始了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起步却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因此,这一过渡过程既是振奋的,又是痛苦的;既是突变的,又是缓慢的。在我们这些后辈子孙的历史包袱中,既有光荣,也有耻辱;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时至今日,举目望之,或见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或见低矮草屋摇摇欲坠;瞑目思之,或对这 100 年津津乐道,或对这 100 年耿耿于怀。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导致了思想的二元结构、身份的二元结构,甚至人格的二元结构……一切变革、一切矛盾、一切进步,无不源于那个苦辣酸甜的 100 年。

时间之车又隆隆驶过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前期,对 100 年经济结构巨变的研究受制于各种政治运动、偏激的思想和落后的方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史学界的研究禁区和研究教条逐步被冲破,研究局面的兴旺几乎到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顶峰。但是,毋庸讳言,目前存在的一个坚固的研究“瓶颈”是经济史研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落后。我们认为,经济史研究应该包括资料建设(数据和事件)、经验教训分析和对经济学理论的修正与丰富等几个部分。中外经济史是人类经济活动丰富的实验报告,记载着人类经济活动——尤其是市场经济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首先要将遗失、散落和残缺的实验报告整理、补充和推算出来,然后才有研究经验教训的可能。在当前中国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大都在经济史上曾经发生过。历史虽不能重演,但有时又是何其相似!譬如,近年来中国的净出口占 GDP 比例、外汇储备、投资增长、

楼市、股市等问题，无不令政府管理层和学界担忧。这种担忧有无道理？继续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不同于物理、化学，无法用实验室方法来确定真伪和选择调控手段，只能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寻找答案。英国在重商主义理念支配下净出口居高不下，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曾连续多年盆满钵溢，投资快速增长是众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走过的老路，楼市和股市的问题在美国和日本都反复出现过。这一切是否对他们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有负面影响，他们是如何解决的？回溯世界经济发展上的经验教训，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对这些问题给出具有历史厚度的参考答案，经济史研究是和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着的。当然，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多有不同，我们不能照搬照抄经验，而应该在历史证明正确的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修正前提假设，增减模型中的变量，得出适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政策建议。经济史属于理论经济学科，我们的研究工作不仅要着眼于应用意义，而且还要着眼于经济学理论逻辑的丰富和发展。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做出了辉煌的成就，是后辈学人的楷模。

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势必要求经济史有基本可以满足研究需要的“基础设施”——经济统计（估计）数据和相关资料。审视当前我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由于政治取向不同造成的选材视角限制，学科知识结构瓶颈的制约造成的可驾驭研究方法的欠缺，即使花大力气建设的资料也不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紧缺的资料依然紧缺。我们不妨虚拟两个实验。

实验 1：让一个军事院校军事学资深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研究二战史，同时，让我本人率领的另一个团队也研究二战史，两家收集、整理和推测的资料应该是有很大差别的。原因在于前者头脑中的军事理论根深蒂固，研究框架几经锤炼日臻成熟，需要何种资料，如数家珍。而我收集、整理的资料集与前者资料集的交集不会很大，原因自不待言。

实验 2：让一个美术学院的资深教授领导一个团队研究 1840 年以来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让刘巍也率团研究同一课题。显然，这两个团队收集、整理的资料之差异要显著大于实验 1。

如果让两个实验继续下去，两个团队得出的结论就不知相差多远了！旁观者也许会说，这两个实验选择的领域太专业了，所受的训练不同嘛。

对，问题就在这儿！同理，经济史也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它应该应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去研究既往的经济运行，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如果在经济史研究中期望得出满意的结论，研究者必须受过较好的经济学训练。我国老

一代经济史家，如严中平、许涤新、吴承明、刘佛丁等先生，扎实的经济学和历史学功底，使他们有上乘的研究成果。在目前国内研究经济史的同行中，年龄大一些的，多数人由于历史的原因，难以补上数理的和数量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这一课了，情有可原。我呼吁年轻的同行不可蹉跎，补上这一课。我相信，经过努力之后，在你面前会打开一扇新窗子，你就可以和窗外的同行对话，窗外的世界很精彩。

在中国，经济学家很少涉足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中必需的数据在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无人做长时序的估算。例如，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有 GDP 估计数据的只有断断续续十来年；国内资料中，货币供应量的数据根本就没有，能用的资料是美国学者罗斯基估算的；人口数据更是众说纷纭，一团乱麻，令研究者无所适从。经济学家的缺位，使得经济史的研究难成正果。这如同研究战争史的不懂军事学、研究美术史的不懂艺术一样，研究者往往囿于自身的知识结构而主观臆断、妄加评论，甚至贻笑大方。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兴起了新经济史学派（即计量经济史学派），苏联随后也出现了热衷于计量经济史研究的一批学者。他们遵循经济学理论和范式的要求，从经济学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出发，发掘和整理既往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变量之统计量数据。对不可能存于文献的关键数据，新经济史学者则根据经济学原理已经反复证明的函数关系，利用已知的数据，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推算出来，从而开辟了经济史中过去无法进行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对过去以点代面形成的定性判断进行科学的检验，证实正确的论断，证伪错误的观点，使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性大大提高。美国新经济史学派对 19 世纪美国国民收入、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生产率、铁路运输效率等数据的估算被认为是他们最卓越的贡献。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进行较长期（40~50 年）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时发现，后发展的国家没有系统的经济历史统计，于是他说服洛克菲勒财团资助设立了 UDP（University Development Program），旨在培养后发展国家的经济统计学者，然后回到自己的所在国家进行历史经济统计资料的整理和推算工作，这项工作是从日本开始的。日本一桥大学的优秀经济学家大川一司带领的学术团队，最先实现了库兹涅茨的梦想。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利用近 30 年的时间完成并出版了由国民所得、劳动力、资本存量、资本形成、储蓄与通货、个人消费、财政支出、物价、农林业、矿工业、铁道与电力、地域经济统计、贸易与国际收支等 14 卷组成的《日本长期经济统计》，同时出版了一批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专著，培养了一批学者。第一卷《国民所得》是根据日本历史上的税收统计资料将日本的国民

收入倒推至 1878 年。他的研究经过反复检验,被世界各国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学者认同。1995 年著名经济史学家尾高煌之助教授带领的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团队获得日本文部省重点项目资助,开始《亚洲历史统计》研究项目的工作,以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的学者为核心,吸收一些其他国家研究亚洲经济史的学者参加,本人有幸在 1998 年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经济史学者加入了这个学术团队,承担一部分该项目的研究工作。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史学界在这方面成果不多,尚处起步阶段。2008 年 9 月本人应邀出席在纽黑文召开的美国经济史学会年会,见到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老朋友陈志武教授,交谈中得知陈志武教授正率队研究中国 1700 年以来的利率,甚为欣喜。盼望早日杀青,以飨学界。

刘巍教授是我的师弟,1995 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师从刘佛丁先生。刘巍原本是历史学学士和硕士,而且 9 年普通教育(小学 5 年,初中 2 年,高中 2 年)全在“文革”中度过。据他自己回忆,念小学时确实实学过加法、减法和乘法,除法没有学过。后来什么时候会的除法呢?实在想不起来了。幸亏刚刚恢复高考的头几年文科考生的数学是参考分或按较大百分比折扣算分,否则他可能与大学无缘了。考进南开读博士时他 35 岁,虽然经济学功底较差,数学功底极差,但优势在于饱读史书,是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于是,刘佛丁先生给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勒令”他必须突破数学这一关,学会数理的、数量的分析框架。据刘先生在世时讲,他这样要求刘巍是有根据的:刘巍当过知青、士兵和工人,是个经历坎坷的东北大汉,应该有坚强的毅力。事实说明刘先生的依据是充分的,用刘巍自己的话说,他在南开的三年是“披星戴月”过来的,并扎扎实实地突破了数学这一关。后来,他不仅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高水平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论文,而且居然当选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的常务理事!

1998 年,刘巍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专业,博士论文题目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研究的时间段是 1927—1936 年。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答辩委员会主席吴承明先生称其作品为“刘巍研究模式”,导师刘佛丁先生则谦虚地说,刘巍是他最省心的学生。上海财经大学杜恂诚教授认为,刘巍是最坚决贯彻南开经济史研究路线的青年学者,并将刘巍的经济史论著定为他所带博士生的必读文献。

作为恩师刘佛丁教授指导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平时,刘巍总是称我为“掌门师姐”,师弟让我为他的专著做序,我不能推辞。我本科是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阶段先后师从刘佛丁、吴承明二位先生学习经济史,金融学不是我的专业,因此只能是谈谈感想而已。我觉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时候货币量和经济总量都是高度

相关的。做出时间曲线来看，都是有规律的同升同降。货币内生论者认为，货币量的变化是国民收入变化造成的；货币外生论者则相反，认为国民收入的变化是货币量的变化造成的。不管何者为因何者为果，货币在经济运行中是相当重要的。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必须对货币供求规律有清楚的认识，否则，研究者可能会有局部的一些研究结论，但无法搞清宏观层面的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起步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本学期我开始给南开大学金融系的硕士研究生开设金融史课程，得知刘巍师弟的新作出炉，所以先睹为快认真阅读了书稿。这也是我敢于答应为他这本书作序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本书的亮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请同行关注：

第一，1913—1926年GDP的估算。作者从总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论框架入手，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做出了估算数据，又从储蓄、进口、投资等几个角度对数据做了验证。工作量之大、估算路径之新颖，国内前所未见。

第二，对罗斯基估算的近代中国货币供应量（1910—1936）层次的认定。作者选择货币量层次，即认定何者为货币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数量分析准则，以各货币量层次与GDP的相关系数最大者为货币，这充分体现了“货币是效率手段物”的经济学思想。

第三，近代中国货币供给的性质能补货币理论之空白。货币理论界对货币供给的性质向有“内生性”和“外生性”之分，而本书作者根据银本位制下中国货币供给量的形成机制，认为近代中国的货币供给既无经典的“内生性”，也无经典的“外生性”，而属靠天吃饭式的“不可控外生性”。一方面暗示了法币改革的重大经济意义，另一方面对经典货币理论提出了新见解。

第四，在近代中国，财政政策无所作为，而货币供给对国民收入起到了“既能拉车又能推车”的作用，这一研究又补了货币政策理论之空白。通过对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美国宏观经济运行分析，作者认为，货币政策这根绳子只能拉车（刹车）不能推车（启动）的前提假设是需求约束型经济，而在近代中国供给约束型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既能拉车又能推车，对这一货币政策理论补足了运行条件。

十多年过去了，刘巍一直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工作，他用主要精力研究国际贸易和金融，经济史研究相对较少。本书的第二作者陈昭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刘巍指导的硕士生，2005年在南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去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工作，主业也不是搞经济史专业，而从事研究生的中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真可谓十年磨一剑，刘巍带着陈昭又开始研究近代中国的货币供给了。刘巍所在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

济史研究中心有南开大学经济史专业毕业的博士 4 人，均有不错的研究成果，而且方向集中、线路清晰。

说到师门，我不禁想起九年前英年早逝的刘佛丁教授……

谨以此文，纪念和告慰我们的尊师刘佛丁教授！

王玉茹

2010 年 2 月 8 日于南开园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
1.1 文献综述	2
1.1.1 现代国内学者近代中国货币供给研究文献评述	3
1.1.2 近代国内学者近代中国货币供给研究文献评述	5
1.1.3 国外学者近代中国货币供给研究文献简评	7
1.2 研究方法	8
1.2.1 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8
1.2.2 本书的研究方法	12
第2章 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货币	23
2.1 对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前提假设的抽象	24
2.1.1 关于近代中国的商品市场	24
2.1.2 关于近代中国的货币市场	38
2.2 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逻辑推理	38
2.2.1 近代中国商品市场的均衡	38
2.2.2 近代中国货币市场的均衡	40

2.2.3 两个市场同时均衡	42
2.3 对近代中国经济运行逻辑的实证——结论检验	43
2.3.1 对商品市场函数的实证	43
2.3.2 对货币市场函数的实证	45
 第 3 章 对近代中国 1913—1926 年 GDP 的估算	47
3.1 从总供求关系角度对 GDP 的估算	48
3.1.1 GDP 估算的逻辑	48
3.1.2 应用实证方法的 GDP 估算	48
3.2 从进口角度对 GDP 估算值的验证	50
3.2.1 近代中国进口模型的建立	50
3.2.2 对 GDP 估算值的验证	50
3.3 从储蓄角度对 GDP 估算值的验证	53
3.3.1 对储蓄模型的讨论	53
3.3.2 对 GDP 估算值的验证	54
3.4 从投资角度对 GDP 估算值的验证	56
3.4.1 投资与 GDP 的逻辑关系	56
3.4.2 对 GDP 估算值的验证	57
3.5 结论	58
 第 4 章 近代中国货币供给量：罗斯基的估算与修正	61
4.1 对近代中国货币供给量两个版本的考察	61
4.1.1 现银存量与白银国际流动的关系	61
4.1.2 对两个版本数据的选择	64
4.2 对 1933—1935 年货币供给量的修正	64
4.2.1 货币供给与国际收支	64
4.2.2 对 1933—1935 年 M_0 的修正	67
4.3 对近代中国货币供给量层次的讨论	69

第 5 章 近代中国货币供给机制：不可控外生性的逻辑与实证	73
5.1 对货币供给决定因素的逻辑分析	73
5.1.1 近代中国货币的特点	73
5.1.2 近代中国货币供给的逻辑表述	76
5.1.3 币制改革势在必行	77
5.2 对货币供给决定机制的实证分析	78
5.2.1 单位根检验	79
5.2.2 货币供给的 ECM 模型	80
5.2.3 Granger 因果检验	80
5.3 近代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外生性分析	81
5.3.1 货币内生外生逻辑 ABC	81
5.3.2 近代中国的货币供给性质——不可控外生	82
第 6 章 中国“绳子”既可拉车又可推车：对理论盲点的解释	85
6.1 无力启动经济的美国货币政策	86
6.1.1 美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只手	86
6.1.2 胡佛政府货币政策效果——绳子不能推车	88
6.1.3 美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另一只手——罗斯福政府的财政政策	89
6.2 中国的货币供给对经济之有效的推与拉	90
6.2.1 近代中国银本位制下的 M_t 伸缩规律	90
6.2.2 近代中国的银根松紧与经济波动	92
6.3 绳子推车的前提：是供给约束还是需求约束	95
6.3.1 需求约束型经济中的美国“绳子”只能拉车不能推车	95
6.3.2 供给约束型经济中的中国“绳子”既可拉车又能推车	97
6.4 扼要的结论与启示	98
6.4.1 结论	98
6.4.2 启示	99

第 7 章 近代中国的货币币值变动与进出口增长	101
7.1 近代中国的货币汇率与银价的关系	101
7.1.1 近代中国货币汇率与银价的逻辑关系	101
7.1.2 近代中国货币汇率与银价的数量关系	102
7.2 近代中国的汇率与进口	104
7.2.1 近代中国汇率与进口的逻辑关系	104
7.2.2 对近代中国进口函数的实证	104
7.3 近代中国的银价与出口	106
7.3.1 出口的理论函数	106
7.3.2 对近代中国出口模型的实证	107
7.3.3 对实证结果的分析	111
附录 1 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基本逻辑	113
附录 2 国际贸易模型中的汇率变量研究	119
附录 3 货币乘数的数学推导	129
附录 4 近代中国部分宏观经济数据	137
参考文献	157
后记	163

第1章 导论

经济史是人类经济活动宝贵的实验报告，我们不可能把历史上的经济运行想象得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想象成一败涂地，有过关斩将，也有败走麦城。总之，经验教训暗含其中，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有极高的政策价值。中国近30年在市场经济之路上遇到的问题大都可以见诸经济史，将其束之高阁而苦思冥想，实乃不智。和当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相似，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经济事件之一是金融变量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产生的动荡。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先是银价猛烈下跌，而后是由于白银的外流造成的银根紧缩，一度成为中国当时经济中的热点问题。”^①这种由外国主导和控制而非本国主导和控制的汇率的急剧变化，引起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的剧烈波动，进而对国内物价水平产生了压力，并因此产生了连锁反应，使中国国内的物价总水平和各城市物价水平发生了外来冲击所造成的被动的变化，加之中国币制是银和制钱并用的双重本位制度，“不仅中国内地广大的乡镇，甚至通都大邑的基层群众都生活在铜币社会中。制钱不仅是交换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收入的计算标准，中国的出口货几乎全部来自农村；洋货向用制钱的群众推销的部分，估计也占进口总值的80%左右。……在这三十年（指19世纪70年代起至1900年止——引文者注）银价下跌的过程中，制钱对银两的比价反而上升了34%。这样，在中国对外贸易上，银价下跌的作用，很大一部分为钱价上升所抵消；以钱计的进口商品物价较内地

^① 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土货物价为低，难怪洋货能大量倾销，使中国原有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总之，在这个时期中，中国的对外贸易严重地受着双重汇率的影响——对外是金、银汇价，对内是银、钱比价。但中国既不产银，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铜产量也很少，铸钱所需铜、锌原料，绝大部分仰赖进口，银价、铜价的变动均受国际资本主义双重的操纵，使中国经济更进一步受它的控制”^①，加剧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性。

在1935年末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以前，“白银在中国是货币，而在国外是普通商品，同时中国既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又不是白银的主要消费国，所以白银的价格和流向非中国所能左右”^②，因此白银必然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发生价格变动，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的货币——白银的价格受到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的制约和影响，白银价格变化的时差导致白银价格的内外不一，必然产生逐利性的商品流动——白银的进出口，同时由于近代中国政府对于黄金和白银基本上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加任何干涉，或者说根本干涉不了，除了1930年5月实行禁止黄金出口，以及1934年10月15日开始的，鉴于白银大量外流威胁到中国银本位制度的存在而对白银征收出口税和平衡税以外，在这之前的近100年间，中国金银的国际流动是自由的，并且不须交纳任何关税，因此白银大量频繁的国际流动，对近代中国国内的货币供给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显著的影响，同时说明了，近代中国的货币供给无疑是一个政府金融当局无法控制的变量，因此，考察近代中国货币供给变化的影响因素，建立相应的货币供给模型，进而为探讨货币供给和经济发展增长的逻辑和数量关系奠定基础则十分必要。

1.1 文献综述

从可以获得的资料来看，新中国建立以来，对于作为货币的白银问题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文献较少^③，主要限于金银比价的变动对于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方面，而且，关于货币供给的数据分析或者挖掘和整理的与货币供给有关的金融数据——如（经验的、惯例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时间序列的利率等——至今没有看到，而对于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角度来研究和探讨影响货币供给的因素，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方法进行相关的分析、

① 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27页。

② 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③ 翻阅历史学文献，我们看到，从厘清历史真相角度研究白银问题的文献是不少的，但对本书的意义不大。

推理和论证则少之又少，就作者目前见到的文献来说，仅有笔者的几篇文章运用了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或者说运用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对于近代中国经济相关问题进行过分析和论证^①。近年来出版的以金融史命名的专著大都局限于中国革命史的框架，多从生产关系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金融结构，而对近代中国货币经济运行的考察和分析很少见诸书中；对近代中国金融结构演变的描述大都是编年式的，数字资料的使用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有什么用什么，以点带面，属不完全归纳法，基本不符合现代经济研究的范式。在各种中国金融史（或类似书名）著作中，没有一个作者考察过近代中国时间序列的或某一时点的货币供应量，对金融要素与其他经济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逻辑关系在经济学意义上的考察和分析就更为少见了。

1.1.1 现代国内学者近代中国货币供给研究文献评述

刘佛丁、王利华、王玉茹三位先生的文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经济——评美国学者近年来关于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讨论》^②一文，论述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白银政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否定了美国学者劳伦·布朗特（Loren Brandt）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在1989年《货币经济学》杂志第23期发表的题为“对有关中国与美国白银政策新资料的阐述”一文中，关于“美国的白银购买计划没有使中国的全面经济活动遭受划时代的、长期的萎缩，没有引起诸如通货紧缩、生产停滞、工厂关闭、银行破产和工人失业等一系列经济恶性事件”的观点，肯定了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在1963年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以及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著作《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两本书中的相关的观点。刘佛丁、王利华、王玉茹三位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提出“1931—1935年期间的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为4.18%，而1914—1931年期间为5.5%”的关于货币供给问题的学术观点，提出了“笔者认为忽视货币供应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尤其就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而言，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尤为重要。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变动所造成的白银的流入和流出，是决定中国物价水平的基本原因，相比较而言，其他因素都是次要的”的学术观点，这是国内近些年来涉及货

① 刘巍：《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与计量模型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36～53页；《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1927—1936）——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81～89页；《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1927—1936）》，《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81～89页。

② 《南开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第73～80页。